

# 中国大陆新老华人移民浅析

· 程希 ·

中国是海外华侨华人的发源地，也是现代华人移民的主要来源。纵观中国海外移民史，从华侨华人的发源到新移民的产生，既有“惊人相似的一幕”，又有质的根本性区别。虽然，一个世纪以来，“排华”的劫难和阴影总是与中国人在海外创业的艰辛和血泪相伴，但时至今日，“移民”依然是中国大陆充满诱惑力的词语。本文试就中国大陆新老移民的差异作一个比较，从而阐明对新移民发展的一些认识。

## 一 新移民出国的背景和遭遇

移民的发生在不同的历史时代、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不同的集团或个人身上有着各种不同的原因，但客观条件的具备和主观愿望的需求，外部因素的吸引和内在因素的促动，却是任何移民活动的发生都不可或缺的。中国大陆新老移民的产生相距达一个多世纪之遥，其间既有迥然相异的本质区别，又有某些固有的内在联系和令人深思的相似之处。

(一) 国门的开启为移民出国提供了客观可能性。

华工是近代华人移民队伍的主体。早期出国的华人移民主要由自备旅费或通过亲友牵引而自由出洋的华工和靠借垫或赊欠旅费而以若干年的劳动或劳动所得作为抵偿的契约华工两部分构成，尤以契约华工占绝大多数，契约华工中又分因生活所迫而自愿出卖劳力和毫无思想准备而被劫掠贩卖的两种。此外，也有出洋经商和因政治原因而被迫流

亡海外的。虽然，中国人侨居海外的历史可以追溯到秦汉时代，西方殖民者在我国东南沿海劫掠和贩卖人口的罪恶勾当也早在16世纪初年即有史书记载<sup>①</sup>，但实际上，无论是华工自由出洋还是契约华工制，都是在鸦片战争后才形成高潮的。明清两代曾以苛律严禁中国人出洋。明朝制定了有关“私出外境及违禁下海”的法规，严格限制国人与“蕃人”的贸易交往及出海。清朝则律令更严，《大清律例全纂》第二十卷《兵律关津节》规定：“凡国人在蕃托故不归，复偷渡私回者，一经拿获，即行正法。凡官员民兵私自出海贸易，又迁移海岛居住耕种者，但以通贼论处，又州县同谋或知情隐匿，亦收处斩。”但1840年以后，英、法、美等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先后用洋枪洋炮轰开了腐朽没落的清政府“闭关锁国”的大门，通过《北京条约》、《中荷通商条约》、《中美天津条约续增条款》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使清政府的海禁成为一纸空文，也使西方殖民者用诱骗、拐卖、劫掠等令人发指的手段掠夺中国廉价劳动力的“契华工制”合法化。与此同时，北美和澳洲先后发现了金矿，淘金的狂热吸引了大批珠江三角洲的穷困农民漂洋出海。此外因中南美洲、东南亚等地种植园和采矿业的开发，北美横贯大陆铁路的修建，巴拿马运河的开凿，南非金矿的开采等等都需要大量劳动力，东南沿海一带的农民或为生活所迫，或为寻求更好的生计，被殖民者诱招、欺骗和拐卖、劫掠而源源流向国外。从19世纪初到20世纪30年代，“前后二百多年出国的华工约有一

\* 本文所言“老移民”主要指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漂泊出洋的华工，“新移民”主要指1979年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以后，以各种方式前往海外定居的华人移民。

千万人次”。<sup>②</sup>

新中国成立以后，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形成的“冷战”格局和极“左”思想的错误指导，中国一度又关闭了国门。但是，经验和教训很快使中国领导人认识到，只有改革和开放才是富民强国的根本出路。因而，从20世纪70年代末起，仅有30年历史的新中国，为赶超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迅速成为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实施了包括首先在主要侨乡建立“经济特区”等重大举措的一系列改革开放政策，使中国以崭新的姿态再一次向世界敞开了大门。然而，毕竟是一个历史时代的刚刚起步，一时间，几乎所有的舶来品都成为中国的时尚，早年洒尽了血汗、经历了无数痛苦煎熬的“华侨”和他们的后裔成为人们最早羡慕的对象。国门的第二次开启，引发了中国历史上第二次大规模的海外移民潮。新移民通过继承财产、联姻、探亲、旅游、留学、劳务乃至偷渡的方式不断流向国外，而且“数量日益增多、流速逐渐加快”。<sup>③</sup>据统计，从1979年至1991年12年间，中国公安部门批准的因私出国者达136万人，其中80多万为移民。<sup>④</sup>

(二) 社会状况的性质差异导致不同的出国意愿。

老一代华人移民是在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过程中被迫出走的。鸦片战争前，由于封建地主阶级对土地的兼并和人口的增多，东南沿海地区“人稠地狭”的问题日趋严重，而清政府海禁和抑商的政策又严重阻碍着商业和手工业的发展。西方殖民者的入侵不仅加剧了这些旧有矛盾的激化，而且造成了新的更深刻的社会危机。其一，两次鸦片战争均以清政府赔款割地而告终。军需粮饷、战争损失、加上巨额赔款，骤然加重了人民的生活负担。战火荼毒之处，商货流通路线断绝，城乡经济长期陷于瘫痪状态，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其二，鸦片的泛滥使白银大量外流，造成银贵钱贱的现象，加速

了手工业者和商人的破产，也使“农民因暗加一倍乃至两倍之赋，生计日困”。<sup>⑤</sup>其三，鸦片战争后，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的商品倾销和原料掠夺，使东南沿海地区的传统手工业受到沉重打击，“英国发明的新机器”，“夺去了中国成百万工人的饭碗”，<sup>⑥</sup>农村自然经济也因而逐步解体，激化了“人稠地狭”的矛盾，为失业大军增添了无数破产农民。此外，此起彼伏的农民起义和祸延十多年的“四邑”人与“三邑”人之间的宗族械斗，则使东南沿海地区人民本已穷困无着的生活更加动荡。就在中国社会一步步走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苦难深渊时，西方殖民者为发展本国经济和开发殖民地的需要，在香港广州等地设招工公司，到处散发传单、招贴，用各种途径进行宣传 and 诱骗，大力招收他们急需的廉价劳动力。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贫困交加的老一代华人移民被迫离乡背井，踏上茫茫海途。至于被西方殖民者拐卖和绑架的华工，流落异国他乡，更非其本愿。

中国大陆新一代移民是在国泰民安、国民经济增长迅速、国家逐步走向繁荣昌盛的发展上升时期主动走向海外的。在他们当中已非往昔目不识丁的破产农民和手工业者充斥，而往往是有相当文化知识水平的、有着较好政治社会地位的各界人士。他们中包括政府机关工作人员，文化、艺术、教育、医疗等事业单位的专业人才，工人和一部分先富裕起来的农民、个体工商业者以及大批的科研工作者和青年学生。他们移民的动机已不再是为了满足最基本的生存需要，而是为了寻求更好的施展才能的机会，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获取更多的财富，或体验一种新的生活方式。新移民中不少人因舍弃国内较好的生活条件到异国他乡忍辱负重另创基业而被谓之“洋插队”。

新移民出国的方式更是他们与老一代华人移民不同出国心态的具体写照。从出国方式看，新移民主要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以家

庭团聚、继承财产、联姻等方式申请的正式移民，第二类是以探亲、旅游、劳务、留学等名义出国后滞留不归的，第三类是近年来愈演愈烈的非法偷渡移民。改革开放以来的10多年间，除80多万正式移民外，大陆公费出国留学进修者超过15万人，自费留学生也在14万人以上，自费留学生绝大多数加入了移民大军（截止1990年底仅有4千多人回国），公费留学者约有三分之二学成未归，有2万多人已入籍居留国。<sup>⑤</sup>近10年来中国向国外派遣的从事国际经济合作和工程承包的劳务人员则约有30万人，有人称之为“新契约劳工”，也成为大陆中国人移民海外的新形态。<sup>⑥</sup>非法偷渡移民，因许多人到达目的地后，就消失得无影无踪，因而无法统计其具体人数，但据一些专家估计，仅每年成功偷渡进入美国的“大陆客”就有10万，而每年合法入美者不过3万人。<sup>⑦</sup>

安土重迁的中国人，从被生活所迫不得不移民转变为改造生活、寻求更大发展的主动移民，是相隔了一个多世纪的时代背景造成了这种鲜明的差异，更是社会状况的不同性质导致了被动和主动这两种截然相反的出国意愿。

（三）对外开放最早的东南沿海地区是产生新老移民的主要源地。

广州是鸦片战争前全国唯一开放的港口，厦门则是西方殖民者掠贩华工的第一个目标。老一代华人移民的产生主要集中在广东和福建。二战前，菲律宾华侨85%祖籍福建，美国华侨60%来自广东。<sup>⑧</sup>其它除相邻的浙江、江苏、广西等省及湖北的天门等个别地区外，很少有移民出国。因此，有人称老一代移民在海外形成的华侨社会实际上是闽粤社会的国外版。

改革开放以后，虽然中国大陆的每一个省市都都开始有新移民产生，尤其是北京、上海等文化教育发达地区的移民增长更快，但已成为“侨乡”的以广东、福建为主的东南

沿海地区仍然是新移民产生的主要源地。从1979年到1991年移民海外的80多万人中，广东一省就有44万人。<sup>⑨</sup>

老一代华人移民，因西方殖民者需要的是能承受漫长的艰辛旅途和繁重体力劳动的苦力、劳工，因而他们几乎都是“身材消瘦、皮肤棕色、有力气”的青壮年男性，<sup>⑩</sup>许多人在兄跟弟、弟带兄、叔侄相帮、父子相携的单性社会中度过了孤寂的一生。而在新移民热潮中，则是出国家庭化占主导地位，并且对大量新移民的产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新移民许多都是一人先行，站稳脚跟后，创造条件，将家庭成员一次或几次带走，完成全家移民的过程。一个家庭出国侨居后，又以同胞、宗亲和联姻关系导致另一个家庭的某个成员进而整个家庭的出国。一些与“侨”无关的家庭，即以嫁女择婿的方法与侨眷攀亲结戚，“打入”华侨家庭，成为它的一员或血亲，更有一些人与海外华侨直接联姻而迁居国外。因而，当年老一代华人移民单身出走留下老弱妇幼形成的侨乡，不仅为新移民出国提供了便利，而且使因沾亲带故而互相牵引出国成为一个主要的移民途径。从“单身汉社会”到家庭移民，这是大陆新老华人移民的天壤之别，而他们之间又有着无法割断的联系。

（四）老一代华人移民遭受的排华劫难在新一代华人移民身上仍有阴影显现。

老一代华人移民凭着吃苦耐劳的顽强生存能力，在语言不通、习俗迥异的异国他乡，以最低微的报酬，从事最艰苦、最繁重的体力劳动，“白人不屑为者我为之，白人不敢为者我亦为之”。<sup>⑪</sup>他们或在白人废弃的金矿淘金，或在遍布荆棘沼泽的荒野拓荒垦殖，或在工程条件异常恶劣的地区修筑铁路和开凿运河，或冒着随时葬身井下的危险挖掘采矿，历经千辛万苦，用死伤累累的血汗为所到之处的繁荣作出了巨大贡献。但是，华工们取得的成就，并没能使他们免遭排华的厄运。虽

然,“让美国选择移民,而非让移民选择美国”是二战以后美国才确立的制定移民政策的指导思想,并为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其它发达资本主义移民国家所仿效,但其根据本国需要来决定对华人移民的取舍的实质,却早已为西方殖民者身体力行。当廉价劳动力成为急需品时,西方殖民者大肆招引,甚至不择手段地拐卖、掳掠华工。然而,一旦华人移民凭着坚韧的毅力逐渐发展起来而被视为妨碍了某一集团的利益或“不可同化”和需要成为摆脱经济危机及某种政治较量的替罪羊,甚至干脆就是不再被需要了的时候,排华的厄运就落到华人移民身上。早在鸦片战争前,因嫉恨华人的商业竞争力,西班牙殖民当局就在菲律宾策划了1603年、1639年—1640年、1662年、1762年—1764年等几次对华人的大屠杀和1593年—1596年、1709年、1746年、1755年和1769年对华人的五次大驱逐。出于同样的原因,东印度(今印尼)的荷兰殖民当局也发动过1740年—1741年残杀华人的“红溪事件”。鸦片战争后,随着美、加、澳、新等国华人移民的增多,这些地方成为新一轮排华运动的中心。在美国,随着西部建设的日臻完善,全国统一的完成,并因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实现而形成垄断经济之时,美国国会于1882年颁行了“排华法案”。此后半个多世纪,美国当局利用排华思潮,阻止中国移民入境,甚至连已在美国的华侨亲属赴美寻亲,也受到种种刁难,先后使18万中国人在“天使岛”受尽了凌辱磨难。<sup>⑩</sup>加、澳、新等国也步美国后尘,实施了一系列的排华政策。二战以后,由于民族主义的兴起,华人又在东南亚成为被排斥的对象。1965年印尼的“9·30”事件,1967年缅甸排华事件,1969年马来西亚的“5·13”事件和1978年越南的大规模排华,使老一代华人移民及其后裔经受了一次又一次空前的浩劫,死伤和财产损失不计其数。

80年代以来,世界各地大规模的反华排

华活动已经平息,但仍有阴影时隐时现。东南亚各国对华人的移民之禁至今未开,零星、个别的针对华人的暴力活动也时有发生。为防止新的排华事件出现,1990年,印尼总统苏哈托甚至号召华人大企业家向合作社不加贴水地出售四分之一的股份,以免“人们经济上的差距,引起社会嫉妒心理,最后导致社会动乱。”<sup>⑪</sup>美、加、澳、新等国虽然从二战后逐步废除了排华政策,以优先吸收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专门技术人材及投资移民和强调家庭团聚的人道主义为原则,平等地打开了接纳华人移民的大门,但在这些国家种族歧视的现象依然存在。而华人社会本身,则因非法移民的偷渡风愈演愈烈和华人黑帮的犯罪活动日益猖獗而蒙上了一层新的阴影。原先,美国出于反共的目的,一向以“政治庇护”标榜其对人權的维护,最近终因不堪负荷,竟以国家安全为由,作出了使其“美式人权面临严峻考验”的举措,“由白宫下令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成立一个包括国防部在内的跨部门小组”,<sup>⑫</sup>全力阻止中国偷渡移民入境。而一面操纵着偷渡活动,一面从非法移民中招兵买马的华人黑帮,近年来则演变成“连财雄势大的黑手党也备受威胁”的黑社会组织,<sup>⑬</sup>他们敲诈勒索、抢劫杀人、非法移民、走私军火、贩运毒品,使所在地区治安严重恶化,成为玷污华人社会形象的害群之马。因而,非法移民的偷渡和华人黑帮的犯罪活动很可能成为新的反华排华的口实。

(五) 非法偷渡与“猪仔、猪花”贩卖如出一辙。

“猪仔、猪花”贩卖是华人海外移民史上一段最悲惨的经历。“猪仔”指我国被外国拐拐卖为奴的契约华工。“猪花”是苦力贸易中被掠卖出洋的中国女子。从移民角度说,华工自愿出洋属于民族移民的范畴,而成为“猪仔、猪花”的契约华工则是属于强制移民。在19世纪的华工出国潮中,只有少数是自备

旅费的自由华工,更多的是赊欠船票的“赊单工”和契约华工。“赊单工”名义上是自费自愿的“自由移民”,实际与契约华工并无根本区别,必须将其一定时期内的劳动所得用来偿还旅费和利息,一旦上了船,更是毫无二致的“猪仔”。西方学者曾把苦力船只称为“海上浮动地狱”或“鬼船”。而“即使是非洲奴隶贸易最盛时期,‘中程航道’中出现过的最黑暗情景,也比不上中国奴隶船上那样可怕。”<sup>①</sup>“猪仔、猪花”象牲畜一样被钉入阴暗潮湿的舱底购运出洋,“由于招诱华工出外人多船少,使业已弃置多年不能再装运客货的欧洲破船,都被高价抢贩”,<sup>②</sup>且严重超载,有时“连伸开腿全坐下来的地方都没有”,<sup>③</sup>有的苦力则“只能永远保持躺着的姿势”。<sup>④</sup>而遥远的航程和变幻莫测的气候,往往使苦力船要历经三四个月甚至半年多艰难的航行才能到达目的地。在这种令人难以忍受的环境中,“猪仔、猪花”又食物恶劣,饮水奇缺,且动辄受到暴虐的凌辱和摧残,遇瘟疫蔓延,许多人便被弃尸大海或被抛上荒岛等死,因超载而漏水、突发事故或触礁沉船更是无人能幸免。据《英国蓝皮书》载:1855年,一艘贩运“猪花”的船英格伍德号还在浙江镇海河口时,船长因“臭气已透到他的舱里”,使他“几天无法睡觉”,令人“将舱板的缝子全部封堵起来”,但最终还是发烧病倒了。当时的一位美国人说:“舱里面的臭气很可怕,我因靠近他们,结果发了高烧”。<sup>⑤</sup>在这样的“海上浮动地狱”中,成千上万名华工未到目的地便被活活地折磨死了。据不完全统计,从中国贩往秘鲁的华工,在19世纪50年代的途中死亡率为32%—40%,60年代前半期为30.44%,以后为19.44%。<sup>⑥</sup>运往古巴的华工途中死亡率,在50年代初期,高达45%;<sup>⑦</sup>若从1847—1873年估算,则平均为15.21%。<sup>⑧</sup>如此高的死亡率,记载了老一代华人移民在世界移民史上最惨烈的一幕。

也许,这一铭心刻骨的痛楚在经历了近一个世纪之后已渐渐被人淡忘了。近年来,作为产生新移民来源之一的非法偷渡活动竟使人们又在中国东南沿海看到了这历史一幕的重演。只是当年的“猪仔”、“猪花”如今被改称为男女“人蛇”,每一偷渡活动的组织者也有了“蛇头”的新称谓。以海路为例,在屡屡被各新闻媒介曝光的偷渡活动中,我们又看到了这样的镜头:数百人挤在狭窄、阴暗、不通风的货轮舱底,食物日渐减少,淡水则更为短缺,数百人吃、喝、拉、洗同在一处,臭气薰天,又常遭惊涛骇浪的突袭,女性则更是饱受蛇头和船员的凌辱遭遇,漂洋过海百多天,犹如“穿行地狱”。<sup>⑨</sup>据《华声报》对偷渡到纽约的“黄金探险号”的报道,由于“散发出一种令人作呕的臭味”,“船到纽约后美国移民局官员和新闻记者都未敢插足舱内,实在无法进入。”<sup>⑩</sup>此与前述贩卖“猪花”的“英格伍德”号是何等的相似!

如果说当年的“猪仔”、“猪花”多是遭人劫掠拐骗,或因生活所迫、逃避祸乱,不得已而为之的话,那么现在的偷渡“人蛇”则可以说是心甘情愿而咎由自取。东南沿海省份是中国改革开放10多年来成就最著的地区,有许多县、市是中国先富起来的代表。当年的“猪仔”都为欠资、“赊单”成行,现在的人蛇则大约要交2.5至3万美元的偷渡费,多数老华侨在国外一辈子都未能攒下如此数额的余款,用这笔钱在中国更可以过上衣食不愁的生活,而“人蛇”们却不惜以金钱和生命为代价,听任“蛇头”的摆布,幻想到国外“淘金”发财。许多人在未抵达目的地之前就已葬身大海或在陆地长途跋涉时“掉队”而不知所终。即使临近目的地,又因美、加、澳等国日益加强的防范措施,偷渡船只无法靠岸,需要“人蛇”自己跳入大海游水,闯关上岸。由于一般都在黑夜进行,能见度差,极易造成伤亡。“黄金探险号”在纽约的抢滩事件就造成10人丧生、多人受伤的

惨剧。有不少偷渡船只则是被发现后又遭遣返。92年美国共截获11艘来自中国的偷渡船。93年上半年,又有10余只偷渡船被截获,被捕偷渡移民达2千人。如1993年2月,载有450名中国人的“伊斯特伍德号”遭美国当局拒绝。1993年3月,乘“东林号”驶向美国的527名男女“人蛇”被遣返厦门。1993年6月,“黄金探险号”在纽约抢滩被发现。澳大利亚、日本、新加坡等国也相继把截获的大部分偷渡者遣返中国。<sup>⑧</sup>即使偷渡成功,因无工作证,受人欺诈骗便成常事。抵达目的地后,若一次付不清偷渡费,则无一例外地沦为黑社会的奴隶,被安排在中餐馆、洗衣店或制衣等行业当工资极低的“黑市劳工”,有的更被黑社会威胁或操纵,参与贩毒、卖淫、诈骗、抢劫、杀人等犯罪活动。付清偷渡费而未隐入黑社会者,其实际生活水准也比在大陆远差几倍,甚至由在国内的万元户变为一无所有的赤贫,每日为生计疲于奔命。

## 二 新老移民的特征比较

从目前来看,来自中国大陆的老一代华人移民和新移民均非所在居留国华人社会的主流。移民的共性和共同的文化背景及民族特性,使他们不可避免地带有某些相似的特征,但由于时代背景和客观条件的差异,中国大陆新老华人移民更多地表现出一些质的区别。

第一,从人口构成看,新老华人移民都以青壮年为主,但老一代华人移民的男女比例严重失调,男性人口居绝对多数,是一种典型的“单身汉社会”。如1850年旅居新加坡的27988名华人中,女性只身2239人,1901年该国华人虽增至164681人,女性亦不过33674人<sup>⑨</sup>。在美国、加拿大和拉美等地,性别悬殊更大。1848年至1850年间,旧金山有4万5千华工,而华女只有16名。<sup>⑩</sup>直至二战前,这一情况仍未有根本改善。而新

一代移民中,男女比例基本平衡,甚至出现了女多于男的现象,如1979年从中国大陆到加拿大的移民中,女性占53.5%<sup>⑪</sup>。前述“家庭移民”更是新移民有别于老一代华人移民的特征之一。

第二,从文化素质看,老一代华人移民大多目不识丁,缺乏基本的文化知识和科学技术技能,如1929—1937年浙江赴欧洲移民中文盲、半文盲占90%。受到初中教育者只有5%。<sup>⑫</sup>新一代华人移民受教育的程度远远高于老移民,有四分之三以上的人受过中学以上教育。数以万计的留学生“移民”更是提高了大陆新移民的整体素质。

第三,从经济情况看,老移民大多是穷困农民和破产者,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在国内难以为生,赴国外又不得不“赔单”、欠费,以作苦力抵偿。而新移民则多是国内相对富裕地区的人员和大中城市有着较舒适、安稳生活和工作条件的机关干部、企事业单位职工、科研人员和大、中学生等。他们在国内均有着较好的政治、社会地位,但在国外仍属经济基础较差者。

第四,从出国原因看,老一代华人移民虽也有希图淘金发财者,但大多都是因生活和环境所迫而不得不外出另寻生计活路的谋生者和毫无出国意愿而被掳掠拐卖者。而新移民出国则主要是经济动因的驱使,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环境和更大的事业发展。

第五,从移民方式看,老一代华人移民无论是自由移民还是契约华工,都是有组织地成批进行的集团移民。而新一代华人移民除了黑社会组织的非法偷渡外,大多是以个人身份进行的独立移民。契约华工、赔单工和自由移民是老一代华人规模走向海外的主要形式。而新一代华人移民则是通过家庭团聚、出国留学、继承遗产、旅游观光和劳务输出等多种途径,个别独自地成为移民。

第六,从移民来源看,老移民主要来自福建、广东、广西、浙江和湖北,此外,除

新疆的朝圣者也有成为移民者外,其它省基本无移民产生;新移民中来自广东、福建、浙江等东南沿海省份的仍居多数,但来自北京、上海等文化教育发达地区的移民迅速增加。如据1988年统计,在旅日华侨中,祖籍广东和福建者分别为5.3%、10.6%,而北京、上海出身者已达5.9%和16.4%。<sup>⑨</sup>此外,各省也都有移民不断出现。

第七,从移民流向看,老移民主要流向西方资本主义列强所属各殖民地及由殖民地而成为独立国家不久的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因为这些地区的开发和建设急需大量廉价劳动力。新移民为追求更好的个人发展机会、优越的物质生活和良好的教育机会,则大多奔赴西欧、北美、澳洲等地区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

第八,从移民职业看,老一代华人移民因文化水平低,大多只能从事简单而繁重的体力劳动,如垦殖、采矿、淘金、筑路及洗衣、餐馆、杂货等。新移民中劳工仍占相当比例。尤其是初抵异国者,一般较难很快找到固定职业,以在餐馆打工或作服务性工作者居多,一些知识分子出国后学非所用的现象也较普遍,有的甚至不得不“停笔从厨”。但总的说来,新移民中从事专业技术工作的佼佼者呈日渐增多的趋势。据统计,新移民在美国跻身工程师、建筑师、教授、律师、医生、银行职员、房地产商等行列及在政府部门工作的人员,占移民总数的21.9%。<sup>⑩</sup>

第九,从心态观念看,老移民因语言不通、习俗不同,又常受来自各方面的限制和排斥,难以同其它民族融合和交流,因而形成一种心理上的自我封闭。他们与异族通婚者很少,与当地社会同化的愿望更是淡漠。但他们的宗亲宗族观念较强,重视参与宗亲社团的活动;家乡观念则更为深厚,衣锦还乡、“落叶归根”是老一代华人移民中绝大多数人的共同心态。新移民身处异域,不同的社会、文化、环境和价值观也给他们带来一定的心理

压力,创业的不易,使许多人失去了过去在大陆的优越感和安全感,但他们融入当地主流社会的参与意识很强,并为此进行着积极的努力。新移民中许多人飘洋过海的目的即为了“落地生根”,与异族通婚甚至成为他们实现“落地生根”的捷径。

第十,从聚居情况看,大多数老一代华人移民终身囿于唐人街,形成相对独立、自我封闭的小社会。新一代华人移民,除非法移民仍主要活动于唐人街外,大多只是希望把落脚的唐人街作为跳板而尽早进入主流社会。他们中已有不少人置身新华埠或其他族裔的居住区,与其他族裔广泛联系,促进了华人社区的多元化。

### 三 新老华人移民与 中国大陆和侨居国的关系

整体说来,从中国大陆出走的新老华人移民队伍只是用“亿”来计算的中国人口中很小的一支,华侨华人在其所在国也基本上是一个人数很少的少数民族(新加坡除外),如1985年在美华侨、外籍华人约有150万人,但仅占美国总人口的0.6%。<sup>⑪</sup>大陆新老华人移民所占人口比例更少。据美国一些研究华人问题的学者估计,在美国出生的华人已占整个华裔的60%以上<sup>⑫</sup>。加之还有来自港台、东南亚等地的华人移民,出生于中国大陆的新老华人移民在华人社会中更显份量不足。据加拿大1981年人口普查的数字,出生于中国大陆的华人移民占华人总数的18%。<sup>⑬</sup>在华人最多的东南亚各国,由于新中国成立后已基本没有华人新移民进入,因此在当地出生的华人所占比例,大大超过美、加的比例。据马来西亚人口调查资料显示,70年代,在中国出生的马来西亚华侨、华人只占华侨华人总数的10%左右。<sup>⑭</sup>但大陆新老移民对本国和当地社会所产生的影响、对侨居国发展所起的作用及为中国革命和建设所作的贡献,远远超过人数多寡所具有的意义。

#### (一)新老华人移民在侨居国所起的作用

### 老移民:

第一,中国大陆老一代华人移民是应西方资本主义上升发展时期开发殖民地或本国经济的需要而组成的劳动大军,他们在黑奴制度废除以后及时地补充了世界各地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劳动力。他们同当地人民一起,用自己的血汗开发了当地经济,促进了当地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为西方资本主义的繁荣和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在荷属东印度,种蔗华工使爪哇发展成当时世界著名的糖业基地;19世纪的锡矿开采几乎全是靠华工用手锄肩挑来完成的;<sup>⑧</sup>在开采锡矿的同时,华工还参与兴建了勿里洞各埠和邦加岛的8个港口;19世纪60、70年代相继到达苏门答腊的华工则和当地人民一起,把棉兰的片片荒野变成一个个以叶薄味醇的烟草而闻名于世的种植园。在英属马来亚地区,荒山野林的开发、农田的垦殖、矿山的开采、港口的兴建、城市的建筑、公路的铁路和修建,也无一不是华工与当地人民共同劳动的结果。如新加坡郊区各城镇及柔佛等地,都是靠华工开发并种植胡椒、甘密后发展起来的。胡椒和甘密的生产成为马来亚地区的“兴邦之母”。驰名世界的马来亚锡矿,基本上是由华工开采出来的。锡矿业的发展,促进马来亚的许多城镇,如吉隆坡、怡保、太平等地的兴起,也带动了整个马来亚经济的发展。进入20世纪后,华工还和印度工、马来人一起使马来亚成为世界头号橡胶生产国,并使这一称号保持了30年之久。没有他们的辛勤劳动,欧美汽车工业就不会有今日这样巨大的发展。

在美洲,华工把中国某些较为先进的生产工具和作物种子带到当地,大量参加了糖国古巴的甘蔗种植和生产,秘鲁鸟粪的挖掘及甘蔗、棉花的栽培,西印度地区种植园的开辟,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矿山的开采、铁路的修建、农田的垦殖,以及巴拿马运河的开凿等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由华工承担

整个工程中最艰巨最繁重部分而完成的美加太平洋铁路,不仅使美、加两国的东西部交通从此畅通无阻,而且使美、加两国的东西部紧密联系起来,从而促进了立国根基尚不稳固的美、加两国各自在政治和经济上的统一。对此,加拿大首相麦唐纳曾在国会中说:“如无华人伟大的努力,太平洋大铁道无法如期完成,对加拿大西部的富源,亦无从予以开发。”<sup>⑨</sup>在巴拿马运河的开凿过程中,华工付出了死亡7万多人的高昂代价。运河的开通,使美国从纽约到旧金山的航程缩短了三分之二,大大促进了太平洋和大西洋之间各国贸易的发展和国际经济的交流。

此外,早期的华工在契约期满后,还开办了深受侨居国人民欢迎的餐馆、洗衣、杂货等行业,活跃了当地的经济。

第二,老一代华人移民还参与了侨居地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反抗殖民统治的斗争,他们与当地人民并肩作战,为当地人民争取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如在19世纪后半叶古巴人民反对西班牙殖民统治的独立战争中,绝大多数华侨加入起义军的行列,与古巴人民一起浴血奋战,终于推翻了西班牙的殖民统治,赢得了独立。为了纪念在这场战争中牺牲的华侨,古巴人民后来在首都建立了一座二丈多高的纪念碑,上面刻着:在古巴独立战争中,没有一个中国人成为叛徒,也没有一个中国人成为逃兵。在东南亚,契约华工掀起了反对荷兰殖民统治的斗争,并成为东南亚国家最富革命斗争性的工人阶级的主要组成部分。在俄国的十月革命中,有三四万旅俄华工参加了红军,<sup>⑩</sup>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献出了自己的鲜血和生命。

第三,随着老一代华人在当地繁衍生息、逐渐认同于当地,华人日益融入当地社会,成为定居国的少数民族之一,他们以自己的民族特色丰富了当地的文化色彩。

### 新移民:

新一代大陆移民则主要为发达国家输入了大量专业技术人材。大量留学生滞留当地便是最好的例证。与老一代华人相比,新一代华人移民大多接受了一定程度的西方文化或其它文化,他们直接促进了中西方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创造了新型的海外华人文化,加速了华人社区向多元化方向的发展。但是,新移民中的非法移民给当地带来的则是诸多的社会问题。最突出的是增强了黑社会的力量。黑社会每年可以从偷渡活动中获取3亿美元的巨利,<sup>①</sup>而且可以从偷渡移民中补充黑社会成员,从而使当地犯罪率上升,治安状况恶化。非法偷渡的经济难民也加重了当地的经济负担。

## (二) 新老华人移民对中国社会的影响

新老移民以其自身的不同特点,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分别对中国社会产生了不同的影响。

### 老移民:

第一,老一代华人移民为中国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孙中山先生称“华侨是革命之母”。1894年,孙中山先生在当时美洲华侨较为集中的檀香山成立了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提出了“扶持国体、振兴中华”的口号,从而拉开了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序幕。海外华侨对孙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斗争从多方面给予了大力支持,包括舆论的宣传、组织的建立、经费的资助以及直接回国参战等等。尤以“慷慨助饷”是一项最为突出的功绩。从兴中会成立至辛亥革命爆发,孙中山先生曾直接领导发动了10次武装起义。这10次起义所耗经费,80%为各地华侨资助。<sup>②</sup>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前后,华侨的捐资运动规模更大、范围更广,款项更多。仅辛亥一年,华侨提供的各种革命活动经费,即达五、六百万元。<sup>③</sup>以后历次革命高潮兴起,均有华侨大量捐款支持。除捐款之外,广大华侨还直接投身武装斗争,著名的有“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和反袁斗争中的加拿大华侨

义勇团等等。

抗日战争时期,广大海外华侨再次与祖国人民同仇敌忾,积极宣传抗日、抵制敌货、捐资出力,回国参军参战,用自己的热血和生命为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了无私、卓越的贡献。在东南亚,广大华侨成立“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招募选拔了3200名合格的南侨机工回国,奋战在千里滇缅公路上,出色地完成了一批又一批抗日物资的抢运任务。在美洲,8年抗战,美洲华侨共捐献了6915万6千余美元。<sup>④</sup>美国华侨还开展了航空救国活动,捐献大笔资金购买飞机,同时训练一批航空技术人才回国为抗战服务。据估计,当时回国效力的华侨青年航空人员约有200人。<sup>⑤</sup>这在抗战时期只有几百架飞机的中国空军中所占的比例是相当高的。

第二,老一代华人移民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1872年,华侨商人陈启源在广东南海县简村开办继昌隆机器缫丝厂,成为中国历史上最早出现的近代企业。在他的带动下,南海、顺德等地“群相仿效”,使广州在19世纪80、90年代成为民族资本主义机器缫丝的中心,从而推动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兴起。据国内一些学者调查,从1862年至1949年,华侨在广东一共兴办了2.1万余家企业(包括房地产业),<sup>⑥</sup>而近代华侨在这87年中对中国大陆的投资总额则为1.28亿美元。新中成立后至1966年,海外华侨、港澳同胞又在大陆投资了1亿美元。<sup>⑦</sup>改革开放以来,老华侨及其后裔继续投资于中国现代化建设,成为外资构成的一部分,并且成为中国对外经济交流合作的桥梁。目前,我国引进的外资总额中,80%是通过侨胞、港澳同胞引进的。<sup>⑧</sup>

除投资兴办企业外,海外华侨的侨汇也是平衡国家外汇收支的重要财政来源。从1864年至1948年,全国侨汇折合美元共约35.1亿元。<sup>⑨</sup>旧中国的对外贸易经常发生逆

差,侨汇在弥补贸易逆差、维护对外收支平衡方面,起了重要作用。

第三,老一代华人移民对家乡的文化教育和公益事业建设也倾注了热情。著名侨领陈嘉庚先生倾资创办厦门大学、集美中学、小学、幼儿园、师范学校,补助各地民办学校经费,这已是尽人皆知的事。马来亚华侨李光前,也在他的家乡福建南安创办了国光专科学校和中学。据统计,从1915年至1949年,福建共有侨办中学48所。<sup>⑥</sup>早期福建的新闻事业,如《福报》、《福建日日新闻》及后来的《华侨日报》、《星光日报》等,也都是由华侨创办或捐助的。海外华侨在家乡兴办的医院等公益事业及修桥、筑路等义举,更是不计其数。

#### 新移民:

因二战后专业科技人才的引进成为欧美澳等发达国家移民政策中的重要内容,因此人材流失是现今新移民对中国社会造成的影响中最为突出的。据统计,在因私出国的新移民中,高中以上文化程度者至少占15%,而目前中国大陆12岁以上人口平均文化程度仅为4.61年,在全国就业人口中,初中生占21.12%,高中生占5.18%。<sup>⑦</sup>显然,新移民的总体文化素质高于现阶段中国人口的平均水平。这对中国这样一个正急需大量人材的发展中国家,不能不说是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专业人材的流失现象更为突出。中科院1万多中青年研究者中,研究生流失率为39%,大学生为20%。从1985年到1990年,中国有1.3万余中高级科研人员赴欧美,未归者占90%以上,其中仅主任医师、主治医师就有4千人,教授、讲师700多人。1982年至1990年有40多名在国内外具有一定知名度或在国际上获奖的文学艺术家加入外国国籍,20多人滞留不归。<sup>⑧</sup>乒乓球是中国的国球,近年来因大批世界级名将和教练移民国外,在重大国际比赛上,常出现“中国人打中国人”的局面,使中国乒乓球的绝对优势

地位受到严重冲击。

#### 四 结 语

移民是一种世界性的现象。从中国出走他国的移民是众多国际移民队伍中的一支。因而,它同样遵循世界移民的规律:由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流动,由比较落后、不易谋生的贫困地区向发展较快、容易谋生的富裕地区流动,以及由比较不安定的地区向比较安定的地区流动。如果说,老一代大陆华人移民多因天灾人祸、饥饿贫困而被迫离乡背井,另谋生路,新一代大陆华人移民则多是在生活环境较为安稳的情况下,为了谋得更优厚的生活条件和更高层次的发展而主动走上移民之途的。中国的改革开放虽然给中国大陆众多渴望出国和移民的人提供了客观可能性,但中国政府对于申请出国者所持的态度一向是负责和谨慎的。中国政府严格规定:意欲出国者必须持有对方国家已表示接纳意向的有关证件,方能申领护照办理出境手续。据统计,1980年世界上约有1400万难民在流动,同期在世界各地经常流动的外籍工人还有3000万左右,而战后迄今华人移民海外的总数充其量不过二三百多万。相对于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强的中国大陆人口而言,从中国这个世界第一人口大国走向他国的移民仅仅是国际移民大潮中的涓涓细流,且中国新移民队伍的整体素质是较高的。相反,如美国等国,虽受到日趋汹涌的非法移民浪潮的冲击,但仍不愿彻底放弃其所谓维护人权的“政治庇护”,这无异于鼓励非法移民的偷渡。因为到美的非法移民只要证明自己是在中国受到政治迫害,或是为了逃避计划生育政策即可被收留。所以才使得偷渡潮一浪高过一浪。

相信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进行,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出国热”终将自动降温,移民潮亦会出现回流。这一趋势在台湾已有了很好的例证。1949年至1983年台湾留美

的9万名学生中,滞留不归的有近8万名<sup>⑨</sup>。但80年代中后期以来,许多人开始返回台湾定居、就业。而80年代涌往加拿大的香港移民潮,亦出现了频频飞回香港的“太空人”现象。大陆高校学生出国的主要途径“托福”考

试的报考人数近年来也呈下降趋势。毕竟,移民是一项受制于多种因素的活动。而且,移民也终究不是谋求幸福生活和更好发展的根本途径和唯一办法。

(作者系中国华侨华人历史研究所研究人员)

#### 注释:

①吴风斌:《契约华工史》,第1页。

②彭家礼:《十九世纪开发西方殖民地的华工》,载《世界历史》,1980年第1期,第3页。

③⑧⑩⑬陈文寿:《论现代华人移民》,载《华侨华人历史研究》,1993年第1期,第25页。

④⑪《广东侨报》1991年5月28日。

⑤李春辉、杨生茂:《美洲华侨华人史》,第23页。

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58年版)卷4,第361页。

⑦《广东侨报》1991年5月28日;《东方时报》1992年6月3日;华林:《引人关注的严重人材流失》,见《华人》1992年1月号。

⑧⑩⑫ [马]星洲日报,1993年6月10日。

⑩张莲英、林金枝:《从历史上看闽南华侨与菲律宾人民的友好关系》,载《东南亚》1975年第1期;陈依范:《美国华人发展史》,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24页。

⑫同①,第466页。

⑬⑭邓蜀生:《关于美国华人历史的几点思考》,载《世界历史》,1988年第1期。

⑮同⑤,第222页。

⑯孔文:《华人与印尼社会共同富裕问题》,载《华人》月刊,1993年6月号,第34页。

⑰《联合晚报》1990年8月17日。

⑱《华工出国史料》第2辑,第465页。

⑲⑳同①,第92页、105页。

㉑参见《华工出国史料》第6辑,第186—187页。

㉒同①,第106页。

㉓⑳㉔:《华工出国史料》第4辑,第236页、209页。

㉕⑳《穿行地狱——“华人移民偷渡美国梦”》,载《华声报》,1993年9月。

㉖《华人》月刊,1993年3月号,第19、20页。

㉗王京治:《侨务知识手册》,第25页。

㉘《世界日报》,1991年4月5日。

㉙《1979年加拿大移民统计》第10—11页。

㉚章志诚:《战后欧洲华侨华人经济变化初探》,见郭梁主编:《战后海外华人变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㉛《美国华人新移民概况》,载《福建侨报》1986年9月10日。

㉜张健青:《美国华侨、外籍华人心态、特点浅析及未来之展望》,见《侨务工作研究论文集》(一),第261页。

㉝同⑤,第443页。

㉞何珠:《华侨社会的变化和国外侨务工作的思考》,见《侨务工作研究论文集》(一),第4页。

㉟同①,第465页。

㊱李东海:《加拿大华侨史》,第124页。

㊲《申报》,1919年5月22日。

㊳同⑤,第702页。

㊴同②,第21页。

㊵同⑤,第718页。

㊶袁礼谦:《美国华侨简史》,1981年11月25日[美]《时代报》。

㊷林金枝:《近代华侨投资国内企业史研究》,第16页。

㊸林金枝:《海外华人在中国大陆的投资及其特点》,见《侨务工作研究论文集》(一),第51页。

㊹红炜:《浅析台湾重视侨务工作的原因及对大陆侨务工作的几点想法》,同上书,第192页。

㊺同⑦,第31页。

㊻林金枝、庄为砚:《近代华侨投资国内企业史资料选辑》(福建卷),第25页。

㊼《新华文摘》1992年第4期,第16页。

㊽黄英潮:《战后华侨的再移民及其原因剖析》,见福建省华侨历史学会编《华侨历史论丛》(五),第40页。